

徐复观 著

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徐复观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1

ISBN 7-80678-336-9

I. 徐... II. 徐... III. 经学-历史-研究-中国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3113 号

策 划 彼岸出版策划室

(汪宇)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伟群

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

徐复观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80 千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678-336-9/B·15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自序	3
西汉经学之形成	5
一、周公及周室之史——经学的发端	5
二、春秋时代经学的发展	7
三、孔子及孔门——经学基础的奠定	10
四、孟子与经学	26
五、荀子——经学形式的发展	32
六、《墨子》中的经学影响	34
七、《庄子》中的经学影响	38
八、《管子》、《韩非子》中的经学影响	39
九、《吕氏春秋》中的经学影响	40
十、六经、六艺的完成	44
西汉经学史	48
一、博士性格的演变	48
(一)博士成立的背景及其基本性格	48
(二)博士演变之第二阶段及其性格	52
(三)博士演变之第三阶段及其性格	54
二、西汉经学的传承	57
(一)《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	57
(二)《易》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58
(三)《书》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73
(四)《诗》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92
(五)《礼》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112
(六)《春秋》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117
(七)《论语》的传承	129
(八)《孝经》的传承	131

(九) 环绕《汉书·儒林传》所反映出的若干情况	134
(十) 由古文到古学——刘歆《让太常博士书》	137
三、西汉的经学思想	143
(一) 汉初经学思想	144
(二) 汉中期以后的经学思想	153
附录 有关《春秋左氏传》的补充材料	166
一、《春秋左氏传》若干纠葛的澄清	166
二、左氏“以史传经”的重大意义与成就	171

《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自序	179
一、引言	185
二、以官制表达政治理想的思想线索	187
三、思想线索在汉代的演进	195
四、思想线索发展的结果——《周官》的成立	201
五、文献线索的考查	209
六、王莽、刘歆制作《周官》历程的探索	218
七、《周官》在文字结构中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	224
八、《周官》在思想构成中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	231
九、《周官》成立的文献背景	235
十、《周官》组织体的形成与管仲	242
十一、读法——以吏为师	249
十二、《周官》中的土田制度与生产观念	251
十三、《周官》中的赋役制度	256
十四、《周官》中的商业与商税	269
十五、《周官》中的刑罚制度	274
十六、《周官》中的教化(教育)思想	285
十七、杂考	299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自序

经学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因而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线。中国文化的反省,应当追溯到中国经学的反省,第一步,便须有一部可资凭信的经学史。

经学史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经学的传承,一是经学在各不同时代中所发现、所承认的意义。已有的经学史著作,有传承而无思想,等于有形骸而无血肉,已不足以窥见经学在历史中的意义。即以传承而论,因西汉已有门户之争,遂肇演而为传承之误。东汉门户之争愈烈,传承之谬愈增。《后汉书·儒林传》成篇于典籍散乱、学绝道丧之余,其中颇有以影响之谈写成历史事实。《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踵谬承讹,益增附会。及清代今文学家出,他们因除《公羊传》外,更无完整之典籍可承,为伸张门户,争取学术上之独占地位,遂对传统中之所谓“古文”及“古学”,诋诬剝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使后学有除今文学家的偏辞孤义外,更无可读之古典的感觉。皮锡瑞承此末流,写成《经学通论》及《经学历史》两书,逞矫诬臆断之能,立口隐逆理之术,廖平、康有为更从而诤张羽翼之,遂使此文化大统纠葛纷扰,引发全面加以否定之局,我常引以为恨。年来在写《两汉思想史》的历程中,随时留意此一问题。在《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一文中,对《春秋公羊传》成立的情形及其本来面目作了深入的剖析。在《原史》一文中,对《春秋左氏传》及《谷梁传》也作了同样的工作,尤以对《左氏传》部分说得相当详尽。一九七九年,写成《〈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书,将此争论两千年之久的问题,作了彻底地清理,为治中国古代官制史、思想史及研究古典的人,尽了一番摧陷廓清之劳。凡此也可以说是我为了写《汉代经学史》所作的准备工作。

一九八〇年五月初,发现胃部不适,饭食时常患哽噎,精神疲困,但还未检查出是胃癌,我赶忙写成《先秦经学之形成》一文,以先秦的资料证明经学非出于一人一时,而系周初以来,由周室之史,经孔子及孔子后学,作了长期选择、编纂、阐述的努力,以作政治、人生教育之用的。这样便把清代经学家们认为经学成于周公或成于孔子的谬执之见,加以澄清了。这篇文章,曾在同年八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中提出。适在此时,因精神更感不支,进台大医院检查,才知道所得的是胃癌恶症。八月二十二日动了切除手术后,躺在病床上,十分痛苦,自知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老朋友们来看望时,我

说：“已活了这么大的年龄，应当死了，可惜我想写的《汉代经学史》，竟没有动笔的机会。”因为这种冷门题目，我不动笔，当代更无人肯动笔的。老友胡秋原先生说：“你可以口述大纲，用录音带录下，由你的学生整理。”实际上，不仅动手术后讲话和动笔是同样的困难，而且写这类的文章，必须扣紧资料，资料不是能凭脑筋记得完全的。

今年三月底到美国休士顿小儿帅军处住了两个多月，一面在安德逊癌症中心进行检查，同时每天勉强工作三、四小时，写成《西汉经学史》的初稿。但初稿写成后，发现写得很乱，便在纽泽西女儿均琴家中重写了一次，经过两个月才写成。一篇文章写两次，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事。二次稿成后，寄给私立东海大学薛顺雄教授，烦他的夫人为我清缮，并托薛君为我重看一遍。这次把《先汉经学之形成》略加修改，和此文汇印在一起，僭称为《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由学生书局印行。我是无法写成一部完整的经学史，假定我这里的两篇文章再加上《春秋》三传的考查，能为今后写经学史的人提供一个新的出发点，便稍可减轻我在这一方面的责任感了。或者还要补写一篇《东汉经学史》，假定没有时间，则《周官》在东汉所引起的困扰，及《后汉书·儒林传》中所犯若干重大错误，我已在《〈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和本文中加以澄清了，也无碍其为“基础”的意味。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我把《汉书·儒林传》及《艺文志》中的六艺略和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的重要部分完全录入，再加以疏通辨析。我知道这是很笨的方法，但也是流弊较少的方法。

这里的两篇文章，前一篇写成于胃癌已经发作之际，后一篇写成于胃癌手术后的疗养之中，文字拙劣、论证谬误的地方更为难免，我恳切希望能得到关心此一问题的学者们的教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自序于九龙寓所

校者按：徐复观教授撰写此序文时，癌细胞已扩散到背部而痛苦不堪，草草成章，思于台大医院治疗后再行重写，但入院后病况更为恶化，无精神再写文章，乃以此文为序言之定稿。

先秦经学之形成

经学是由《诗》、《书》、《礼》、《乐》、《易》、《春秋》所构成的。它的基本性格,是古代长期政治、社会、人生的经验积累,并经过整理、选择、解释,用作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的。因而自汉以后两千年来,成为中国学术的骨干。它自身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在形成的历程中,孔子当然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但孔子并非形成的开始,也非形成的终结。“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之说,^①在历史中很难成立。至于说“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斯乃所谓集大成者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之说,^②尤为鄙陋。以下试就经学由发端以至完成,作概略性的陈述。

一、周公及周室之史——经学的发端

周公是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宗教性很浓厚的文化,转向“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③的人文性很浓厚的文化的关键性人物,我在《原史》一文中说明他特别重视历史的教训。^④《左》昭二年,晋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是《易》与鲁《春秋》与周公有关系,而“周公制周礼”^⑤几乎成为一种常识。周公曾自己作

① 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此为清代今文学家的通说。

② 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章氏鄙陋的根源之一,系将文化学术的创发与传承,完全安放在统治阶层之上。至清代古文学家言经学,以周公为主,乃由刘歆、王莽曾提倡古学,而又缘饰周公以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将两者傅合而成。实则刘歆们并未排斥博士们的今文学,更未曾将经学中的孔子地位转移到周公。此观于班固本刘歆《七略》以为《汉书·艺文志》而可见。

③ 见《礼记·表記》。

④ 此文收入《两汉思想史》卷三,见页二四〇——二四二。

⑤ 《左》文十八年鲁太史克谓“先君周公制周礼”。

诗、作书，^①作《七月》以陈王业之艰难，作《鸛鷖》以救乱。据《国语·周语》，《时迈》、《棠棣》两诗亦周公所作以明教戒。推而广之，由周室之史所编的诗，都含有教戒的意义。周公作《大诰》是教诰“多邦”“御事”的，作《康诰》、《酒诰》、《梓材》是教诰康叔的，作《洛诰》、《无逸》、《立政》是教诰成王的，作《多士》、《多方》是教诰“商王士”及“四国多方”的，《君奭》是教勉召公奭共弼辅成王的。《召诰》是召公教诰成王的。推而广之，周室之史，编成虞、夏、商诸篇，亦皆所以为教戒之用。《墨子·天志》篇中，“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这段话，是顺着他自己的思想来说的，但由此可以了解，《诗》、《书》的成立，其目的在由义理而来的教戒，并不在后世之所谓史。《荀子·天论》篇：“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周初犹是神话盛行的时代，但将《书》与《周书》及《穆天子传》相较，即可发现在书中所保存的神话最少。这即可证明，为了教戒的目的，在编纂时作了很大的选择。当然，这些被选择、编纂而遗留下来的教材，同时即是历史中的重要资料，并能给历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选择、编纂的动机与目的言，这只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歪曲了经之所以为经的基本意义，把经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

由上所述，可以把经学的历史追溯到周公，也可以把儒家的历史上推到周公。所以《荀子·儒效》篇，便以周公和孔子为“大儒之效”作证。但经学的成立，是由《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古典再加上乐^②为其基本条件。《诗》、《书》、《礼》皆由史官所纂辑、保管。周公时代，距纂辑成书的时代尚早，

① 《书》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皆出自周公。而据《诗》序，《七月》、《鸛鷖》为周公所作。据《国语·周语》，祭公谋父谏穆王将征犬戎时，谓“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是《时迈》之诗为周公所作。富辰谏襄王将以狄伐郑，引“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棠棣》之诗为周公所作。又芮良夫因厉王说（悦）荣夷公，而叹“王室其将卑乎”的话中，说《周颂》的《思文》及《大雅》的《文王》皆周公所作。

② 乐的纪录，应如今日乐谱的性质，乐亡，乃其曲谱之亡。故乐不可能有文字记录的典籍。《乐记》之类，乃言乐的理论及效果，不可称为《乐经》。乐本无经。

《易》尚停留在纯占筮的阶段,且当时似乎尚未流行;《春秋》指的是孔子所修的,不是就周《春秋》、鲁《春秋》而言。所以就整个经学史说,周公尤其是周室之史,可以说是发端的“先河”,距“后海”的时间尚远,何以能说是“集大成”?

二、春秋时代经学的发展

通过《左传》、《国语》看春秋时代,可以说是经学进入到成长的阶段。《左氏传》鲁僖公二十七年,晋“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穀可,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由此一故事,可以了解:(一)《诗》、《书》、礼、乐,此时已连结成为一组的名称。(二)说《诗》、《书》是义之府,礼、乐是德(按指行为而言)之则,《诗》、《书》、礼、乐已与现实生活连结在一起,发挥着教戒的作用。(三)赵衰数闻郤穀之言,而所言者乃《诗》、《书》、礼、乐,是此时的《诗》、《书》、礼、乐,已成为贵族间的基本教材。这三点,都是经学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把《诗》、《书》、礼、乐连成一组,正反映出这是出于在古代史料中所作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只能推测是出于周室史官之手。《诗》、《书》的内容,尔后还有增加,也只能推测这是周室之史继续他们的编纂工作。

我在《人性论史·先秦篇》中,曾为春秋时代特设一章,而称之为“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之出现”。礼、乐、《诗》三者,常作关连性的活动。所以通过《左氏传》以观察春秋时代的文化活动,可以总结为是《诗》、礼、乐三者互相关连的活动。对于《诗》,除赋《诗》以外,引“《诗》云”的最少二十次,^①引“《诗》曰”的最少七十七次,^②引“《诗》所谓”者最少五次,^③引“故《诗》曰”的最少八次。^④当时的乐,主要是以《诗》为主题,此观于《左》襄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

① 见开明书局出版《十三经索引》,页一四六。

② 同上,页一四六〇——一四六一。

③ 同上,页一四六一。

④ 同上,页一〇二八。

“请观于周乐”，而乐工所歌者皆为《周南》以下之诗；《国语·鲁语》下鲁叔孙穆聘晋时，述歌诗之所宜，亦皆与乐合在一起，即可证明。对于《书》，引“《书》曰”的最少十次，^①引“故《书》曰”的最少四次，^②引“《夏书》曰”的最少十一次，^③引“故《夏书》曰”的最少三次，^④引“《商书》曰”的最少四次，^⑤引“《商书》所谓恶之易也”一次，^⑥引“《仲虺之志》”者一次，^⑦引《太誓》者两次，^⑧言及《康诰》及蔡仲“命书”者各一次。^⑨有些是先引《诗》而接着引《书》，有些是先引《书》而接着引《诗》，即是《诗》、《书》同时并引。^⑩这种引用，常在两相对答之间，由此可知当时贵族对《诗》、《书》的熟练。我所根据的索引，非常疏略，只有漏列而无溢出。我只想借此反映出当时《诗》、《书》所发生作用的概略面影，较汉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周当然已有占筮，并且已将卦辞、爻辞编纂在一起。但除《洪范》中曾卜、筮并提外，在文物中并不多见，甚至还没有发现。据《左氏传》，春秋时代，由鲁庄公十二年追记陈敬仲出生时，“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起，大约一共记载十九次有关《周易》的事情。^⑪以《周易》为筮，除僖十五年秦系由卜徒父执行外，余皆属于史的职守。因史的文化水准较卜人为高，故史对卦辞的解释，已较卜人对卜兆的解释，含有较多的合理性。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不仅由史所主管，而且也成为贤士大夫教养之资。《左》昭

① 见开明书局出版《十三经索引》，页一一三九——一一四〇。

②④ 同上，页一〇二四。

③ 同上，页一一一二。

⑤ 同上，页一一九。

⑥ 《左》庄公十四年。

⑦ 《左》襄公三十年。

⑧ 《左》襄公三十一年及《左》昭公二十四年。

⑨ 《左》定公四年。

⑩ 例如，《左》襄公二十五年卫太叔文子“《书》曰……《诗》曰……”，《左》昭六年晋叔向“《诗》曰……《书》曰……”。

⑪ 《左》庄公十二年、闵公元年二年、僖公十五年秦、晋各有筮事。僖公十五年、二十五年，宣公六年，成公十六年，襄公九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昭公元年、五年、七年、十二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哀公九年。

十二年，卫“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按指爻的六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子服惠伯非史职而曾学《易》，因而对《易》作了合理的解释，则其他士大夫中亦必有学《易》的，因而推进了《易》的理论水准。所以《左》宣公十二年，晋知庄子引《周易》师卦的“师出以律，否臧凶”，而断“此师（晋师）殆哉”，这种判断是根据《周易》中的合理性所作的判断。而《左》襄九年记鲁穆姜对随卦“元亨利贞，无咎”的解释，被后来乾《文言》作者所采用，由此可知穆姜亦深于《易》。《左》襄二十八年记郑子展引《周易》“在复之颐，迷复凶”，以论“楚子将死”；《左》昭元年记秦医和引“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以论晋侯之疾，这都可反映出《易》在当时教养上所发生的作用，是相当广泛的。

《国语》中所反映出的以礼、乐、《诗》互相关连的活动，正与《左氏传》相呼应。其中引用《诗》的很多，此处未作统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语》“穆王将伐犬戎”，在祭公谋父的谏辞中，引有被认为周文公（周公）所作的《周颂·时迈》。厉王说（悦）荣夷公，在芮良夫叹“王室其将卑乎”里面，引有被认为周文公所作的《周颂·思文》及《大雅》的《文王》，这证明西周已开始以《诗》为教。《论语》下鲁大夫闵马父戒子服伯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的一段话，证明《商颂》之出于殷，可以改正《史记·宋世家》之误。《论语》下鲁叔孙穆子聘于晋，论乐与歌各有所宜，可以窥见《诗》与乐在朝聘中的分际。《晋语》四载齐姜劝晋公子重耳不可安于齐的一段话中，引有《大雅·大明》之七章，《小雅·皇皇者华》的首章，及“西方之书（韦注：“西方谓周，《诗》云，谁将西归……。”）”，《郑风·将仲子》之卒章，和管敬仲之言，与瞽史之记（董因答公子重耳“吾其济乎”之问，亦引有“瞽史记”），由此可以反映出当时贵族妇女所受教养之高。《楚语》上申叔时答士匭傅太子之方，历举出《春秋》（按此殆指楚之《梲杌》而言）、《世》（韦注：“先王之世系。”）、《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九种教材，并简切指出各教材在教育上之意义，由此可以反映出当时楚文化已可媲美于上国。《国语》中引《书》及

与《书》之性格相类者凡十有二。^①引《诗》与《书》之形式,与《左氏传》完全相同。言及《周易》占筮的凡三见:一为《周语》单襄公的“遇乾之否”,二为《晋语》晋公子重耳亲筮之得“贞屯悔豫”,三为《晋语》董因(史角之后)的“得泰之八”。解释的方法与《左氏传》中所用的完全相同。《齐语》主要述齐桓、管仲之事,言及礼义及其他德目,而未及《诗》、《书》;《吴语》、《越语》中,未尝涉及《诗》、《书》,这说明此两国通上国之日浅,尚未渐渍于《诗》、《书》之教。由此亦可反映出其他有关纪录是可以信任的。

总结上面所述,由《左氏传》、《国语》所表现的春秋时代,《诗》、《书》、礼、乐及《易》,成为贵族阶层的重要教材,且在解释上亦开始由特殊的意义进而开辟向一般的意义,由神秘的气氛进而开辟向合理的气氛,这是经学之所以为经学的重大发展。但《诗》、《书》的编纂,要到春秋中叶始告完成;而孔子所修的《春秋》,乃成于春秋之末;《易》的十翼,更迟在孔子以后。所以这依然是经学形成中的一个重要历程。

三、孔子及孔门——经学基础的奠定

孔子生当春秋末期(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对古代文化,包括春秋时代

① 《周语》上(一)内史过引“《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韦注:“逸《书》也。”(二)又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韦注:“今《汤誓》无此言,则散亡矣。”(三)又引“在《盘庚》曰……”。(四)《周语》中单襄公论“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中引有“先王之教”、“夏令”、“周制”、“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五)单襄公论郤至之未能违乱,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韦注“逸《书》”。(六)又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韦注“今《周书·太誓》无此言,其散亡乎”。(七)《周语》下单襄公论晋周子之将为晋君中引“吾闻之《太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八)单穆公谏景王将铸大钱引“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韦注“逸《书》也”。(九)《郑语》周史伯答郑桓公之问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十)《楚语》上左史倚相责申公子亹之言中引“《周书》曰,文王至于日中昊,不皇暇食”。(十一)白公子张谏灵王中引有“武丁于是作书”凡四十五字,韦注“贾、唐云,书,《说命》也。昭曰:非也,其时未得传说”。(十二)《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韦注“《周书》,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吕刑》也”。

贵族间的文化,作了总结、阐述、提高的工作。就经学而论,孔子删《诗》、删《书》的说法是难于置信的,但他在下述三点上,给了经学以决定性的基础。

第一,他把贵族手上的文化及文化资料,通过他的“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既修之于己,且扩大之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三千弟子,成为真正的文化摇篮,以宏扬于天下,成为尔后两千多年中国学统的骨干。《论语》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①乐附丽于《诗》、《礼》,所以《史记·孔子世家》便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能使贵族的物质生活普及于平民,这是平民物质生活的大进步;同样地,能把贵族的文化教养普及于平民,这是平民精神生活的大进步。第二,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②把《诗》、礼、乐当作人生教养进升中的历程,这是来自实践成熟后的深刻反省,所达到的有机体的、有秩序的统一。此时的《诗》、礼、乐,成为一个人格升进的精神层级的复合体。即此一端,便远远超越了春秋时代一般贤士大夫所能达到的水准。第三,从《论语》看,他对《诗》、《书》、礼、乐及《易》,作了整理和价值转换的工作,因而注入了新的内容,使春秋时代所开辟出的价值得到提高、升华,因而也形成了比较确定的内容与形式。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③恢复以乐配《诗》的原有的合理状态,这即反映出他对《诗》所作的重要整理工作。由《诗》在春秋时代的盛行,《诗》对人生所发生的功用,当然当时的贤士大夫已经感受到。但一直到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的提出,^④《诗》对人生社会政治的功用,才完全显现出来。《诗》的所以有此功用,乃来自《诗》得以成立的由个体感情通向群体感情的激动。兴、观、群、怨的功能的陈述,即是《诗》的本质的陈述,这是一针到底的对《诗》的把握,用现代语来表达,这是对《诗》的深纯彻底的批评。《诗》的本质是永恒的,孔子对《诗》的批评也是永恒的。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泰伯》。

③ 《论语·子罕》。

④ 《论语·阳货》。

《论语》上只有两处直接提到《书》，^①在今天看来，这两处所提的都不算重要。惟或人“子奚不为政”之问，实难以对答之问，而孔子随口援《书》以为自己作解释，由此可知他对《书》的熟练。最重要的是，孔子把整部《书》中的人与事加以消化，吸其精英，明其义蕴，由此以抽出政治上最高的若干原则及最大的鉴戒，并由此而指出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他晚年作《春秋》的动机与是非褒贬的准据，这便超越了春秋时代贤士大夫一枝一节的援引、论述的层次，把《书》的价值升华到新的水准。下面孔子的话，只能解释为从《书》中得出来的：

(1)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

(2)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同上）

(3)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同上）

(4)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5)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

上面“予有乱臣十人”，见于《左昭》二十五年襄弘所引的《大誓》，其他的话，离开了《书》，更找不出来源。孔子从《书》所得的政治原则，是(1)与(2)的天下为公。(1)的“而不与焉”，说的是不以天下为己有；(2)的“唯尧则之”，是说尧法天生万物而无私。这些话，是从《尧典》、《舜典》、

① 《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一作子）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不为政。”朱元晦《集注》以此处所引之《书》为《周书·君陈》篇。按今《君陈》篇为伪古文，则此处的“《书》云”，可视为逸《书》。又《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按此处之《书》，见于《说命》。惟今《说命》为伪古文，《无逸》有“其在高宗，……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则此处之所谓《书》，可视为《无逸》。

《大禹谟》^①中的用人行政及政权移转的情形所得出来的。用人能否得当，对治乱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3)便特别提出唐虞及武王得人的情形。(4)则称赞禹个人生活的刻苦，但对鬼神、黻冕、沟洫等政治上的大事，无不竭心尽力。(5)与(3)应关连在一起来了解，因为舜以天下为公，又有臣五人，所以他可以无为而治。总结上述三点，可以说是孔子从《书》中所抽出的政治上的最高原则。“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亦根据《商书》而发明三人之行迹不同，但其忧宗国、爱人民之心并无不同，所以皆许之以仁。盖当淫昏之主陷国家于危亡之际，人臣所执之节非可拘以一端，以见在权变中各有所当。这种论人的态度，与宋代理学家大有出入，更与后来以忠于一人的“忠君”思想大相径庭。尤其重要的是，《论语》最后的《尧曰》章，历二千年无人能了解这是孔子从《书》中所得出的在历史演变中世运兴亡的大规律，平日曾不断把表现这种大规律的故事提出来告诉门弟子，门弟子所以特别记录下来，以作《论语》所指向的归结。兹将原文分录于后，并加以简单解释。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②“或曰，此其为《书·舜典》之文欤？今《舜典》亡，无由稽也，然其为《书》辞则无疑矣”。此为尧传天下于舜而加以戒勉之辞。简氏谓“历即《尧典》历象之历。盖历象以纪天，而天之历数，以天子即位之年纪之。今传位而纪年，则天之历数在递传者之身矣”。《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段话，即是发明此处“允执其中”的意义，也可以说，这是孔子中庸思想之所自出。由今日中国现实上，人民在左与右中颠倒而无所托命的情形

① 《尧典》现存。自阎若璩以来皆认《舜典》亡，伪古文分在《尧典》“帝曰钦哉”下增二十八字为《舜典》。惟赵翼《陔余丛考》卷一“《舜典》当从‘月正元日’分起”条，以“月正元日”以下系《舜典》原文。陈澧谓赵“所驳最精审”（见《东塾读书记》卷五）。是《舜典》未亡，“汉时在《尧典》之内”。此说亦可供参考。现《大禹谟》系伪古文，但孔子当能看到真《大禹谟》。

② 按简氏此书远胜刘宝楠《论语正义》，而时人不知重视，殊为可惜。